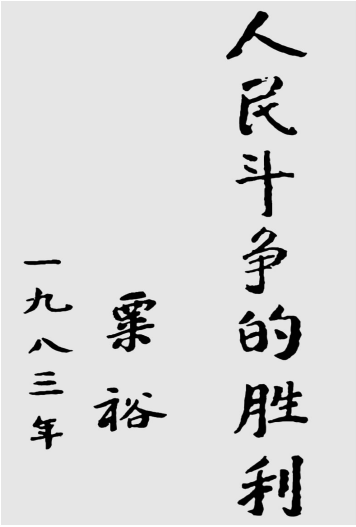


东南警卫团四战崇明

□李元冲



东南警卫团主要领导合影(1943年)
左起:赵一德、程鹏生、梅永照、沈坚如

战斗在海启地区的东南警卫团虽然只是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但他们按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战法,兵民紧密结合,不仅消灭了成倍于自己的敌人,而且紧紧拖住了海启大地上4000多敌人的正规部队,使敌人分身乏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粟裕为东南警卫团团史——《东南雄鹰》的出版专门题词“人民斗争的胜利”。东南警卫团主要战斗在海启地区,但把隔江崇明岛的革命斗争看作是己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不仅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援崇明人民,还为崇明的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提供了坚强的后方基地,并且还四下崇明支持崇明人民对敌作战,为崇明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浴血奋战、在所不辞。

一下崇明岛首战告捷。1945年初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剧变,日本鬼子在华东、华南战场急急败退。北撤在海门倪家镇(今临新区内)的崇明县工委(1940年奉命北撤至海门)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南下打回崇明去。为此苏中四分区党委决定调任东南县委的郁谦(时任启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担任崇明县工委书记,并迅速扩建了原崇明县的江防大队,重建海启江防大队,由东南警卫团统一领导。新组建的江防大队由郁谦任政委,同时调任龚兆林(时任东南警卫团作战参谋)任大队长。海启江防大队的主要任务是趁日本鬼子溃败之机重新“打回崇明去”。东南警卫团研究了当时的崇明形势:一是伪军为了防止驻在海门的崇明县工委进攻崇明,兵力主要集中在崇明的北部沿江;二是处于崇明岛中部南侧的新河镇,有地下党的区乡组织,十分活跃。因此决定首攻新河镇。1945年7月19日,郁谦和龚兆林带领江防大队四连,从启东出发绕道至崇明岛南侧攻打新河镇城隍庙的伪军据点。20日夜晚在夜色掩护下飞兵疾驰新河镇,迅速包围了城隍庙,旋即跃过庙沟,剪断铁丝,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进去,同时敌人发觉鸣枪时,正在熟睡的伪军已成了瓮中之鳖,全部当了俘虏。这次夜袭,因事先进行了多次侦察,摸熟了地形,掌握了详细敌情,同时得到了崇明地下党的密切配合,所以未伤一兵一卒就攻下了新河镇据点。紧接着又夺取了新河镇的伪军粮仓,共缴获了步枪100多支,子弹数千箱,更重要的是夺得粮食700多担,解决了我军后勤供应的燃眉之急。第一次赴崇作战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

二下崇明岛东击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东南警卫团决定乘着新河镇战役的胜利,夺取由国民党控制的崇明县城,任命东南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沈坚如为行动总指挥。再说海启江防大队在新河镇战役后,群众参军踊跃,队伍迅速扩大,后改名为崇明县大队,仍由郁谦任政委、龚兆林任大队长。8月26日下午,沈坚如召开了攻城军事会议,决定先解决驻守在崇明城外学宫据点内的敌人,然后夺取县政府。敌人守城的布防图为:“苏海”大队一中队150余人驻守在东门及学宫内,二大队120余人驻守在万

安仓南北一线。根据敌人的兵力布防,我军的战斗方案为:东南警卫团三个连设伏于东操场一带,佯攻县城,同时打击城内出城援助的援敌;县大队主攻城外的敌人据点(学宫),同时派出部分人员设伏于学宫正面的南堤河下,打击溃退的敌人。8月30日午夜,我军从长兴驻地出发直插县城。深夜12点,县大队向学宫据点内的守敌发起总攻,这时进行佯攻的我东南警卫团战士,喊声震天,吓得敌人不敢出城增援学宫。翌日清晨,学宫驻军全部缴械投降。崇明国民党县长孙云达胆战心惊,急电向上海求援。8月31日,敌方派原忠义救国军孙信民部300余人入城增援防守县城。由于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强行攻城的代价过高,所以上级下令暂缓攻城,部队撤至施家河一带休整待命。

三下崇明岛攻城不克。东南警卫团二下崇明后一个月,苏中四分区党委认为有必要拿下崇明这块国民党势力十分猖狂的地方,于是增派南通警卫团与东南警卫团共同作战。再说二下崇明的我攻城部队撤出县城后,孙云达不仅重新占领了学宫,而且又在城外增设了桥镇据点。为防止东南警卫团再次攻城,孙云达又请求国民党上级部门增加了张九龄大队的3个连守城,这样敌方的总兵力增至1000多人(含孙云达的守城部队、孙信民的增援部队和张九龄大队)。孙云达又在岛内搞起了白色恐怖,“清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土豪劣绅又乘机反攻倒算。为此苏中四分区决定再次教训一下孙云达。

1945年9月中旬,东南警卫团和南通警卫团各出主力部队在苏中四分区专员梁灵广、地委副书记洪泽率领下,从海门灵甸港出发,分乘30多条帆船再次南下崇明,指挥所设在南盘淤镇(今港西乡政府驻地)的北双小学内。9月17日晚,部队包围了县城,冒雨发起进攻。孙信民部依靠精良的美式武器,凭借坚固的城墙,居高临下从城上向我军阵地打击。而我方由于缺乏攻城的重武器,激战一日两夜,攻城未克。时值国共和谈之际,崇明又非全局的战略要地,为顾全大局保存实力,9月19日,我方主动撤出攻城部队(包括崇明县大队),根据上级命令,再次撤回至江北。崇明县大队撤到江北后,部分战士编入了东南警卫团,部分战士回崇明开展反清剿斗争和锄奸斗争等秘密工作。

四下崇明岛大获全胜。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即百万雄师过大江,23日一举解放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这振奋人心的消息给一江之北的东南警卫团和驻在海门倪家镇的崇明县工委以极大的鼓舞,东南县委和崇明县工委立即组建了崇明县政治保卫大队(简称县大队),为接管崇明作准备。县大队政委仍为郁谦,大队长由吴思义(时任东南警卫团教导队长)担任。并从东南警卫团抽调来一批干部和战士充实县大队(1950年县大队改名崇明县警卫团)。

1949年5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5军的一个团从崇明海桥港登陆,向县城进发,与此同时,崇明县大队也从海门灵甸港出发,在小竖河上岸登陆后配合主力部队围攻崇明县城。部队首先拿下了县城外围的桥镇据点,守卫桥镇的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大队,被

我军强大的攻势迅速歼灭,溃退的桥镇守敌全部撤到了城内顽抗。县城的守敌是国民党江苏税警团。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向水警团劝降未果,于6月1日上午9时集中火力攻城。下午3时,攻城部队向水警团团长全裕谦发出最后通牒,限于午夜12点前投降。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全裕谦于午夜11时向攻城部队投降。6月2日清晨6时,人民解放军接管县城。上午8时,水警团在东门外大校场缴械投降。崇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本文参考资料:《崇明县志》《崇明人民革命斗争史料》《海门县志》《启东县志》《东南雄鹰》等。

记 忆 海 门

故事里的卞之琳(连载)

第二辑 著译春秋(五)

□丁士凤

该书的《序言》收入自己的多种文集中。

17.为新中国奋笔疾书

春暖花开的1949年4月,卞之琳始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上英诗、文学翻译、作文等课程,并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理事。他目睹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同年11月在《文艺报》发表《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之后又发表《学习英文文学的问题》。翌年5月4日,卞之琳发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指出“‘五四’运动可以比作芽,比作花,全国的革命形势就可以比作花,比作果”,明确把自己归入人民文艺工作者行列,投身于新文化建设热潮,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在此十年前,卞之琳奔赴延安与前线,写出了诗集《慰劳信集》,之后没有写过诗。但在1950年6月,美国策动联合国军悍然侵入朝鲜,还侵占我国台湾,卞之琳对此义愤填膺,著文《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在《文艺》刊物上发表,义正词严进行谴责和正告。同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卞之琳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情,诗潮奔涌,于11月初写作《战争与和平》,以铿锵有力的诗句警告战争贩子:“交给全世界人民,当战犯审判来奠定和平……”在之后的三个多星期,卞之琳又作诗二十几首,合计八百多行,他认为产量贫乏的自己,可算是次丰收了。为写这组诗的最后一首《天安门四重奏》,卞之琳对天安门的思想感情如此深厚,多么浓厚,诗绪迸发无法控制,并持续了两三天,自付至少得写两三百行,可一想第二天早上要去上课,只好将这首诗写成了四十八行。

卞之琳所写这么多的抗美援朝、反对侵略战争诗作,陆续在报刊发表,然后结集书名为《翻一个浪头》,于1951年2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这是卞之琳的第六本诗集。

《翻一个浪头》一开篇,卞之琳就以“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为起势,过渡至“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为递进,再进入“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为高潮,以充分表达中国人民齐心协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气势犹如巨浪翻滚,力量无比强大,注定侵略者必将被淹没埋葬,落个可耻的下场。因而,让广大读者读来痛快淋漓,斗志越发昂扬!在《工厂就是战场》中,卞之琳写出了广大工人的作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火线远在千里,就近在铁砧上发光!”又写农民支援抗美援朝的《从乡村出发》中,“我出人,你出粮,他出款”,充满浓浓的爱国情。《金丽娟三献宝》,刻画女青年献婚戒、送爱人去战场、自己报名上前线等感人事。《翻一个浪头》是具有思想深刻和艺术特色的诗集。

1951年春节后,卞之琳到江南吴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回京写作《两种光景的交替》报告文学等,并经修改,先后发表于《新观察》《北大周刊》,以及《文艺报》。

1953年初,卞之琳赴浙江青何乡参加整社工作,直至秋收结束。他在《文艺报》发表《下乡生活五个月》一文,并将访问江苏松江、吴县等地的见闻,写作了反映农村新风貌的《秋收二首》和《采菱(外二首)》共五首诗。由于卞之琳认真深入实际,作风扎实,熟悉了农村,掌握了农民生产、生活与心理真实状况,使诗篇饱含感情,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地农民在田地地头、莲塘中、桂树下、稻箩前、绳车旁……一幅幅欢快劳动的情景,并以口语化、民歌风轻快流畅地表达。如《搓稻绳》中写:“一根稻草接一根,两股交成一条绳,一条心捆万把绳,万户人变一家人。”又如《采菱》中写:“采菱勿过九月九,十只木盆廿只手,看谁采菱先采齐,绿杨村里夺红旗。”上述五首诗,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与《文艺月报》。

1958年初,卞之琳与北京民众一起参加修筑十三陵水库劳动。他被人民的坚强意志、奋斗伟力而感动,写作了《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六首,发表于当年的三月号《诗刊》,将建设者们改变山河的气魄彪炳于世。为支持阿拉伯各国民族开展独立运动,1958年6月,卞之琳写作《支援三首》和《巴格达条约断在巴格达》诗四首。这跟他在1950年就已写过的《红河水:献给越南人民》诗一样,积极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这多年里,卞之琳激情澎湃,为新中国诞生写作了许多诗文,对于开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1956年6月,卞之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未完待续)

认真,你们就不几戏,
客气,来一个“敬礼!”
要不然,“村公所问话!”

在《慰劳信集》中,所辑入的二十首新诗,是卞之琳分别写给抗战前线的将领、士兵,后方的工人、农民、开荒者、妇女、儿童,以及所有为抗日贡献力量的人,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慰劳信集》是卞之琳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重要转折点,迈入新的开端。

16.《十年诗草》铭记徐志摩

那是1925年,卞之琳在麒麟镇北的启秀初中读二年级时,由国文老师杨宗时推荐,邮购得徐志摩新著《志摩的诗》初版线装本。徐志摩是“新月派”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作品大多具有比较积极的思想意义,构思精巧,意象新颖,韵律和谐,让卞之琳异常喜爱。

世上有巧事。到了1931年初,卞之琳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由重到北大任教的徐志摩教英诗课。这位戴近视眼镜的年轻教授风度翩翩,和蔼可亲。课上在讲英国浪漫派诗,尤其讲诗人雪莱时,徐志摩的两眼望着窗外,或是朝着天花板,其实是在自己作诗,犹如天马行空般吟咏不已……一次徐志摩讲自己从小近视,有一天在上海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到晚上抬头一看,发现满天星斗,心里无比激动,诗的灵感也是这样来的……卞之琳听着不由心生无限敬意,并认定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不仅是才子,也是热情人。

果不其然。很快,师生间相互熟悉,关系十分融洽。就在有次课间,也不知怎的,徐志摩竟举步走近卞之琳,含笑关切地问:“你也在写诗吧?”骤然听到徐教授对自己这样关爱的询问,卞之琳先是不由一脸赫然,继而矜持了片刻,但终于壮胆从提包里取出一卷诗稿给了徐教授。哪会想到,徐志摩就将卞之琳的诗稿带回上海,与作家沈从文一起看了,都很赞赏!随即,从中选取多首,并代为署上作者的姓名,交给《诗刊》等杂志发表了。同时,徐志摩决定将卞之琳的诗稿编为一本集子,因有《群鸦》一诗取名为《群鸦集》,拟交新月书店印行,其出书预告就在《新月》月刊上登载;并由沈从文为《群鸦集》写作了《附记》,在南京《创作月刊》上发表。

卞之琳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署上真名在期刊上发表,备受鼓舞。得知徐志摩还要为自己出版诗集,并答应给《群鸦集》写《序》,更是无比感激!因卞之琳已经发表了译作,引起译界的注目。其间,徐志摩给卞之琳先后写过三封信,信中称赞卞之琳所译哈代的《倦旅》,译得“极佳”,比自己的译本“高明得多,甚佩”;还向卞之琳推荐翻译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所有这些,都让卞之琳对徐志摩敬重有加。

谁知,不幸之事突然发生。就在当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卞之琳正在红楼的一间小阅览室里阅读英译本《红与黑》时,突然传来一阵匆匆的脚步声,见管理员惊惶地说:“徐先生死了,他坐飞机出事了!”原来,这天早上,徐志摩乘坐飞机往北经过山东上空时触山,不幸遇难。卞之琳一听到这噩耗,就再也读不下去了,默不作声,掩卷还书,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阅览室……

痛失恩师徐志摩,对卞之琳是多么大的打击!也就在这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徐志摩曾写给卞之琳最后一封短信。由于徐志摩的遇难,印行卞之琳的《群鸦集》也被书店搁置,终未出版。

虽然与徐志摩实际交集的时间不足一年,但是卞之琳对师恩难忘。在诗人徐志摩遇难十周年的时候,卞之琳感念这位恩师,致力将自己所创作的新诗选编为《十年诗草(1930—1939)》一书,以深切缅怀徐志摩给自己的真情教诲和热心扶掖!卞之琳为该书写作的《〈十年诗草〉题记》中说:“……为了私人的情谊,为了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提倡的热诚和推进技巧于一个成熟的新阶段的功绩,而把我到目前为止的诗总集(我不认为《十年诗草》是我的诗选集)作为纪念徐志摩先生而出版吧……我算是向老师的墓上交了卷……”

《十年诗草(1930—1939)》于1942年5月由明日出版社出版。它汇集此前卞之琳的全部诗作,包括曾雕木板试刷过十几册样本的《音尘集》,题赠张充和而因战争爆发未及出版的《装饰集》,出版过单行本的《慰劳信集》《音尘集外》等。评论家赞誉卞之琳的新诗诗艺精湛,形成在新诗发展中融古化欧、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1982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徐志摩选集》,卞之琳精心选诗目,写《序言》。《徐志摩选集》于次年9月出版。之后,卞之琳又将

(上接3月18日A7版)

15.亦诗亦信《慰劳信集》

全面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号召文化界人士给前方将士等写慰劳(致敬之意)信,以示慰问,并作鼓励。那时,卞之琳在延安准备上抗战前线。他已一年半未写诗了,竟以诗体先写了两封(首),一封是写给抗日战士的,另一封写给修筑延安飞机场工人的,并发表于《文艺战线》。卞之琳回到大后方后,继续以诗体写了十八封(首)。他写作这些诗,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发自内心的政治感情,宣传和歌颂各界人士齐心协力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与斗争精神。

卞之琳锐意创新的这二十首诗,合为《慰劳信集》,于1940年1月在昆明(实为香港)明日出版社出版发行,广受读者的好评。

写真人真事,是《慰劳信集》的一个显著特色。

如问:“这首《给地方武装的新战士》诗的素材哪来的?”

原来,卞之琳在抗战前线的采访中,也深入当地的小游击队,会听到那些有趣的事。有个新当兵的农民,在一次站岗时发现了敌人,他不开枪打目标,也忘了发信号给部队,而是气喘吁吁地奔回去向班长报告说:“兵来了!兵来了……”幸亏班长战斗经验足,迅速带领战士们奋勇出击,打退了来犯的那股敌人。这位新战士为何会这样?卞之琳分析,他忘记自己也是一个兵了,一个酷爱和平的农民平时是最怕兵的,总是不乐意意见兵的。他不是没有勇气,只是对于战斗生活还不熟悉,在紧张的情势下自然会反映他善良的本性。卞之琳还听到有些新战士遇见敌人的排枪子弹飞来时,不由自主地拿起自己头上的草帽来挡,就像挡雨。为鼓励新战士们在战斗中成长,卞之琳就在诗作中写道:

如今不要用草帽来遮拦,
(就在挡惯斜雨的地方)
这些子弹!这些是子弹!
卧下,就在养活你的地上!
……
再报告“兵来了”自己也要笑,
不要兵你自己就做了兵。
踏倒了老庄稼要他赔新苗,
你保证了乡里来日的青春。

突出人物的鲜明形象,是《慰劳信集》又一特色。

如《抬钢轨的群众》诗,卞之琳写铁路沿线的民众为切断日本侵略者的军货、士兵运输,把“牢牢压制下的钢轨”撬翻。“向来是钢轨上接送行人,如今人带了钢轨旅行”,“十里路一歇脚”,“十里路换上另外的肩膀”,“让钢轨从肩膀到肩膀压过去”,“要送三百里”,“小小的山村,小小的熔炉”就是“旅途的终点”。于是锻造出了“刺刀和枪膛”,于是成了游击队员们手中的刀枪。这是多么震慑敌人的景象和力量!诗人还由此拓展与深化:无限的面孔,无限的花样!破路与修路,拆桥与修桥……不同的方向里同一个方向!
又如在《前方的神枪手》中,诗人对“笑”的形象,刻画得多么传神又有趣趣: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后,你看得见的,如果你回过头来,胡子动起来,老人们笑了,酒窝深起来,孩子们笑了,牙齿亮起来,妇女们笑了。

诗句口语化,则是《慰劳信集》彰显的另一个特色。

卞之琳十分重视撷取人民群众中的精彩口头语言,结合诗意恰当运用,因而使诗作生动鲜活,富有生活气息与感人的情趣。纵览此集中的二十首诗,使用群众的口头语言唾手可得。如在《放哨的儿童》中的第三节,所用的口语令人称绝。

把棍子在路口一叉,
“路条!”要不然,“查!”



卞之琳研究

